

第三章

曖昧的「抵抗」：日本「亞洲門羅主義」話語之興起

太平洋！太平洋！君之面兮錦繡壤，君之背兮修羅場。

——梁啟超《二十世紀太平洋歌》¹

從上文對德國的案例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德國理論家之所以對「門羅主義」發生濃厚興趣，是因為它可以被用來證成和加強德國原有的政治空間訴求，尤其是可以在一戰後美國活躍在歐洲政治舞台的背景之下，對美國的潛在干涉起到排斥作用。在日本，「門羅主義」得以廣泛流傳的原因與德國類似。日本運用「門羅主義」進行大陸擴張的結果，也與德國類似。

「門羅主義」進入日本之後，迅速與既有的呼籲亞洲各民族以日本為盟主團結起來抵抗歐洲列強侵略的「亞洲主義」²話語結合起來，發展成為日式「門羅主義」，強調「東洋是東洋人的東洋」或「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抵抗」某些或全部歐美列強對本區域事務的干涉；然而這種貌似強調「區域自主」的話語，不管其意圖如何，其在歷史中發生的實際效果卻是為日本對朝鮮、中國等國的侵略提供了話語支持。在二戰期間，致力於為「大

東亞共榮圈」提供法學論證的日本國際法學家們更是從施米特的「大空間」理論中汲取靈感，推進日本自身的「廣域國際法」理論建設，試圖將日本對偽滿洲國以及汪偽政權的支配納入法律框架。

在近代西方入侵之前，東亞區域內的各國有朝貢秩序的概念，有華／夷之辨的意識，但並沒有「亞洲」意識。各國是在西方殖民者的炮艦之下，了解殖民者帶來的「亞洲」名稱，進而意識到自身所處的類似的被壓迫地位。從 19 世紀中期開始，「亞洲」這一外來的名稱在東亞各國越來越多的接受，這一名稱不僅具有地理含義，也暗示着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秩序中的被壓迫者的某種連帶關係。在 19 世紀 50—60 年代，日本的平野國臣、佐藤信淵、勝海洲等人一度主張「日清提携」，共同對抗西方入侵。尤其是被稱為日本近代海軍「第一人」的勝海舟，還積極向日本的政壇精英推廣日本應建立海軍、聯合亞洲各國共同對抗歐洲入侵的主張。¹

而清朝外交官員試圖將「亞洲」的概念與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結合起來，期待清王朝以朝貢體系中心的角色，在「亞洲」發揮其傳統的領導作用。1876 年 1 月 24 日，李鴻章在與日本使臣森有禮圍繞朝鮮問題的談話中，就曾以「亞細亞」的觀念，質問日本破壞朝貢關係：「我們東方諸國，中國最大，日本次之，其餘各小國均須同心和氣，挽回局面，方敵得歐羅巴住」「高麗與日本同在亞細亞洲，若開起仗來，高麗係中國屬國，你既顯違條約，中國怎樣處置，我們一洲自生疑釁，豈不被歐羅巴笑話。」²在接下來幾年中，當中國與沙俄矛盾突出時，張之洞、黃遵憲等都曾主張加強中國與日本的關係，尤其是黃遵憲受到宮島誠一郎的影響，主張中日兩國在

1 張品興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427 頁。

2 野原四郎將「亞洲主義」界定為「一種呼籲亞洲各民族以日本為盟主團結起來抵抗歐洲列強侵略的主張」，並得到竹內好的贊同。參見竹內好：「亞洲主義的展望」，高士明、賀照田主編：《人間思想》（第 4 輯），台北：人間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56 頁。

1 陳海忠：《晚清中國與日本：博弈百年》，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9 頁。

2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98-303 頁。

朝鮮問題上合作，甚至直接勸告朝鮮方面將沙俄作為亞洲共同的敵人，¹這些主張都體現了清朝官員在西方壓力之下產生的「亞洲」意識。

但鑒於同時期日本在朝鮮、琉球和中國台灣的擴張不斷危及朝貢體系，清朝外交當局不能不將日本作為與歐洲列強類似的對手，因而其「亞洲」意識也不可能轉化出一種「亞洲主義」的外交政策——衆所周知，李鴻章常用的國際戰略是「以夷制夷」，當日本在朝鮮的影響力不斷增長之時，李鴻章的策略是將歐美列強的勢力也引入朝鮮以平衡日本，這從根本上是一種「均勢」（balance of power）戰略。

在清朝官員從話語上將「亞洲」概念與朝貢體系結合之時，日本的「興亞論」也在繼續發展，其不同於清朝官員的「亞洲」話語的特點在於強調日本在亞洲的領導權，如 1879 年草間時福提出：「今日我國為亞細亞諸國中開化先進之國，率領諸邦擔當東洋連橫之業，捨我其誰。」²日本的「興亞論」者創建了振亞社，其後繼者為興亞社，並於 1880 年發展為興亞會，1882 年又改組為亞細亞協會，1891 年又有東邦協會的創設。³民權運動激進派代表大井憲太郎主張日本作為民主的先行者，應幫助亞洲各國推進國內的民主，1885 年，大井憲太郎、小林樟雄等原自由黨左派人士試圖購買武器，製造炸藥，幫助流亡日本的朝鮮開化黨人士反攻朝鮮，事敗被捕，此即所謂「大阪事件」。1893 年樽井藤吉以漢字出版《大東合邦論》，以「黃

種人」為號召，鼓吹朝鮮與日本「合邦」，進而與中國「合縱」，共同抵禦西方侵略。此可謂「興亞論」的力作，在中國影響了康有為等人在甲午戰爭之後的外交政策論述。¹

但與此同時，明治維新的階段性成功，以及中國在抵抗歐美列強侵略時的不斷失敗，也催生了以「文明、開化的日本」鄙視「頑迷、守舊的中國」的強烈意識。日本政治家杉田定一在 1884 年中法戰爭後批判中國，反對日清友好論；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於朝鮮「甲申政變」被清軍鎮壓之後，作蔑視中國、朝鮮等亞洲鄰邦的《脫亞論》，產生很大影響。1894 年甲午戰爭爆發，福澤諭吉精神振奮，高呼這是一場「文明」對「野蠻」的戰爭²，並為戰爭慷慨捐款。這場戰爭沉重打擊了中國的藩屬體系，中日兩國簽訂《馬關條約》，日本在東亞的優勢地位日益突顯。

然而，1895 年，俄、德、法三國政府認為日本從《馬關條約》中獲益過多，打破了東亞的勢力均衡，於是集體出手實施「三國干涉還遼」，這對日本的「大陸國家」雄心構成重大打擊。1896 年，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沙皇政府簽訂《禦敵互相援助條約》（中俄密約），俄國在中國東北的影響力與日俱增，這被日本官方視為一種強大的威脅。1897 年，德國出兵佔領中國山東膠澳，從而引發英國與德國在中國的爭奪。1898 年，美國贏得美西戰爭，獲得對菲律賓羣島的主導權。

以上種種事態，都對日本朝野精英的心態產生比較大的影響：如果中國被列強瓜分，日本是否會成為下一輪瓜分的目標？美國在佔領菲律賓之後，會否危及日本在亞洲的生存？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日本官方一邊繼續以歐洲列強為範本推動內政改革，以求達到歐洲列強的「文明」標準，從而廢除領事裁判權，另一方面，也着手對民間的「亞洲主義」進行

1 茂木敏夫：「中日關係式的語境——19 世紀後半葉」，劉杰等著：《超越國境的歷史認識：來自日本學者及海外中國學者的視角》，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21 頁。

2 草間時福「東洋連橫論（東洋連橫論）」『郵便報知新聞』1879 年 11 月 19 日。

3 狹間直樹《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試圖以 1898 年東亞同文會為界，從日本的「亞洲主義」發展歷史中分出一個帝國主義特徵不那麼明顯的早期階段。〔日〕狹間直樹：《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張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 年版。不過，這裏的問題是，無論是「脫亞論者」還是「興亞論者」，在面對日本侵略朝鮮、琉球乃至台灣，旨在摧毀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朝貢體系的政策時，往往有高度驚人的一致，很少有人會批判日本政府的政策。同時，許多「中國保存論」者觀念中的「中國」，其領土範圍都要遠遠小於清朝的版圖，這種「保全論」實際上為日本覬覦「滿蒙」留下了廣闊空間。

1 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9 年版，第 387 頁。

2 福澤諭吉「日清の戦争は文野の戦争なり」（1894 年 7 月 29 日），慶応義塾編『福澤諭吉全集（福澤諭吉全集）』第 14 卷，岩波書店，1961 年，第 491 頁。

有限的支持。「亞洲主義」與「門羅主義」概念的結合，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發生。

一、「亞洲主義」與「門羅主義」概念的結合

美國的「門羅主義」話語究竟是從何時開始影響日本的決策精英？最了解美國外交政策的，當然還是美國自己的外交官。1872年12月，在上年末派出的巖倉具視使節團還在考察歐美各國之時，日本外務省聘請了曾任美國駐廈門領事的法裔美國人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擔任顧問，為日本侵略台灣出謀劃策。這位老謀深算的外交家以美國的「門羅主義」為藍本，向日本執政精英建議推行一種日本版本的「門羅主義」：「人們必須勇敢地採取行動，以期在亞洲升起太陽旗，並擴大我們的帝國。為了成為亞洲各個國家的保護者，防止歐洲向我們的領域擴張，這些行動是必要的。這一政策類似於美國在歐洲滲透和侵略美國勢力範圍之際所採取的政策。」¹

在19世紀70年代，這是非常激進的主張，因為在西方的眼裏，日本只是一個「半開化」國家，就連與西方平起平坐的資格都沒有，更不要說模仿美國的「門羅主義」，主張自己的勢力範圍了。李仙得建議日本執政精英，必須將這一計劃深藏在心，但要儘可能地在國際上宣傳，日本正在努力地幫助整個亞洲從野蠻和原始的階段擺脫出來，邁向文明階段。²而具體的做法，是「儘可能平定和教化他們，如果做不到……消滅他們，或者以其

他方法對待他們，就如同美國與英國對野蠻人所做的那樣。」¹

李仙得於1875年辭任外務省顧問，直到1890年赴朝鮮之前，一直住在日本，並曾擔任大隈重信的私人顧問。在日本吞併琉球、侵略台灣、覬覦朝鮮的背景下，李仙得將美國的勢力範圍思想，傳遞給了當時正在銳意學習西方的日本執政精英，並進一步激發了他們的野心。²

儘管李仙得為日本在亞洲的地位積極謀劃，但他在文明觀念上仍然是一個西方中心主義者，與當時日本主流的「亞洲主義者」相去甚遠。我們需要問的是，日本的「亞洲主義」究竟從何時明確尋求與「門羅主義」話語的結合？「興亞論」代表人物之一、日本右翼團體玄洋社創始人之一，以及黑龍會顧問頭山滿曾指出：「提出東洋是東洋人的東洋這一口號的人，霞山公是第一人。亞洲民族應團結一致抵制西洋諸國的暴慢，並驅逐其侵略野心，首倡大亞洲主義的也是霞山公。公引例美國的門羅主義，提出實行亞洲門羅主義之義務，在於以日本與支那的雙肩為基礎的日中提攜，其先見之明與達識雄圖至今仍敬服不已。」³所謂「霞山公」，即日本貴族院議長近衛篤磨公爵，日本第34、38、39任首相近衛文磨的父親，曾具有留學德國波恩大學和萊比錫大學的經歷。

1898年東亞同文會成立時，近衛篤磨擔任了首任會長。該會幾乎一統日本既有的「興亞」組織，並有不少高官和貴族加入，名為民間組織，實際上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發揮「民間外交」的作用。1898年初，近衛篤磨在《太陽》雜誌第4卷第1號上發表了著名文章《同種人同盟——附研究中中國問題之必要》，該文如同樽井藤吉一樣，將黃白人種之間的衝突置於顯著

1 Robert Eskildsen, ed., *Foreign Adventurers and the Aborigines of Southern Taiwan, 1867–1874*, Nankang, Taipei: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c Sinica, 2005, p. 209.

2 關於李仙得對日本明治時期外交政策影響的研究，see Sandra Carol Taylor Caruthers, “Charles Le Gendre, American Diplomacy, and Expansionism in Meiji Japan”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Colorado, 1963).

3 吉田靱明編『巨人頭山滿翁は語る（巨人頭山滿翁的話）』感山莊，1939年，115頁。

1 Sophia Su-fei Yen, *Taiwan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1836–1874*, Hamden, CT: Shoe String Press, 1965, p. 196.

2 Ibid.

地位：「以我來看，東洋的前途難免成為人種競爭的舞台。即使通過外交政策可以解決一時事態，但那只是權宜之計，最後的命運仍是黃白兩大人種的競爭，在此競爭中，支那人和日本人共同處於以白種人為仇敵的位置。」¹近衛主張「支那人民的存亡，與其他國家休戚相關，也關乎日本的命運。因此，應該從今天起，以友愛之情對待支那，勸誘它、開導它，使其進步、促其發奮、去其猜疑、除其妒忌，使它產生對日本親近及依賴之心，以使兩國人民之間產生保護人種之默契。」²這就是著名的「支那保全論」。近衛認為「雖然清國的國勢已衰，但其弊在政治不在民族，直至啟發利導，攜手保全東洋，豈為難乎？」³

1898 年 11 月，在接見來訪的中國流亡維新派領袖康有為時，近衛篤磨又闡述：「今天的東洋問題已不單純是東洋問題，它已經成為世界問題。歐洲列強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東洋競爭。東洋是東洋人的東洋。東洋人必須有獨立解決東洋問題的權力。美洲的門羅主義也是這個意思。實際上，在東洋實現亞洲的門羅主義（亜細亜のモンロー主義）的義務就落在了貴我兩邦的肩上。」⁴不過，一旦康有為提出藉助日本力量打擊慈禧、營救光緒的主張，近衛篤磨的態度就變得十分謹慎，強調必須要顧及其他列強的態度。近衛的謹慎態度，體現的正是日本執政精英當時的複雜心態——一方面，日本迫切需要獲得歐洲列強對其「文明國」地位的全面承認，因而「黃白種戰」之類說法，只敢在私底下說說，絕不敢變成官方表述；另一方面，日本又擔心列強瓜分中國導致「唇亡齒寒」——儘管日本在 1900 年也

派兵參與了「八國聯軍」侵華，但列強種種瓜分中國的議論，也會讓日本朝野不少人士對日本的未來感到憂心。

早稻田大學教授、《太陽》雜誌主筆浮田和民 1901 年發表的《帝國主義與教育》就表達了這種無力感：「雖欲提倡亞洲乃亞洲人之亞洲的日本式門羅主義，但為其落後時代而頗感無奈。日本今日唯一得以倡導之帝國主義，只能是基於國際法，向歐美諸國充分伸張本國人民權利，同時扶植亞洲各國獨立，為此而誘導促其改革而已。」¹浮田在此時認為，在中國，「日本經濟地位落後於英國，政治地位落後於俄國」，中國並非像朝鮮那樣那樣能滿足日本的迫切需要，因此日本對華責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累贅。²

1901 年 2 月 3 日，內田良平、平山周等主張日本對俄採取強硬政策的人士發起成立黑龍會，該會名稱取自黑龍江，本身就顯示出該會人士與沙皇俄國競逐黑龍江區域霸權的野心。黑龍會綱領第一条称「吾人弘扬肇國之宏謨，阐明東方文化之大道，进图东西文明之和睦，期以成為亞細亞民族振兴之领袖」，显示出非常鲜明的「亚洲主义」的色彩。³头山满担任了黑龍會顧問。值得一提的是，近卫篤磨、伊藤博文、井上馨、大隈重信等政要，當時都主張對俄採取強硬政策。1902 年，英國為牽制沙俄勢力，與日本締結同盟，與全球頭號列強簽訂平等同盟條約，這對日本的國際地位是一個非常顯著的提升。1904 年，日俄戰爭在中國東北爆發，日本得到了英美資本的支持。黑龍會與日本軍部合作，組織了名為「滿洲義勇軍」的游擊隊，與俄軍作戰，在戰後又致力於鞏固日本在朝鮮的統治以及對中國東北的擴張，扮演了日本大陸擴張急先鋒的角色。

1904 年 10 月 23 日，曾在 1898 年擔任首相並在 1902 年大力促成英日同

1 近衛篤磨「同人種同盟附支那問題研究の必要（同人種同盟，附支那問題研究の必要）」『太陽』第 4 卷第 1 號，1898 年，1 頁。

2 近衛篤磨「同人種同盟附支那問題研究の必要（同人種同盟，附支那問題研究の必要）」『太陽』第 4 卷第 1 號，1898 年，1 頁。

3 近衛篤磨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磨日記 別卷 近衛篤磨日記付屬文書（近衛篤磨日記 別卷 近衛篤磨日記附屬文書）』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69 年，第 401 頁。

4 近衛篤磨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磨日記（近衛篤磨日記）』第 2 卷，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68 年，195 頁。

1 浮田和民『帝國主義と教育（帝國主義與教育）』民友社，1901 年，35-36 頁。

2 同上書，第 74 頁。

3 〔日〕堀幸雄：《戰前日本國家主義運動史》，熊達雲譯，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6 頁。